

# 編後語

近年來，台灣民主選舉實現了政黨輪流執政，被視為華人社會政治制度的成功轉型；而在大陸，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政局大致穩定，也似乎證明中共權威主義體制政治的有效性。然而，關心中國長遠發展的學者卻不能不從學理和制度建設角度，反思這些表像背後的理據和政治隱患。本期林毓生的文章剖析台灣從兩蔣政權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發展歷程，揭示其「私性政治」的性質，它導致台灣民主實踐喪失了公民政治的基礎，最終淪為煽動民粹主義的選舉炒作。台灣的政治發展印證了當年殷海光先生提出「民主的基礎建設」的重要意義：如果沒有法治的確立、公民文化的培育以及公民社會的養成，自由民主的理想終將會成為泡影。同樣，公民政治的闕失也是目前大陸政治的潛在危機。吳增定在檢討康曉光用「行政吸納政治」模式來闡釋大陸政治穩定原因後指出，「非政治化」策略不僅不適用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且無法養成公民的政治認同與政治德性；而以經濟發展為政績、從而使政體獲得合法性，強調精英整合、罔顧民眾利益的種種政策，在經濟發展速度減慢或衰落時就會失效，也將威脅社會的穩定。蕭瀚與蕭濱則分別對卞悟和吳國光兩篇文章作出評論，他們都認為中國發展陷入了對政治改革既迫切需要又難以實施的兩難困境，而建立真正公民社會的法治和公共領域，及其相應的包含着對平等與公正訴求的權利觀念與自由理念，都是啟動中國政治改革所必需的。

吳冠軍的文章指出，安德森在最近一次北京的演講中，將羅爾斯《萬民法》的論點闡釋為一種「新帝國主義」話語，並質疑他「左翼知識份子」身份，這是採用了有違學術規範的方法去曲解羅爾斯的觀點；接着，他進一步探究「左翼」名號如何成為知識界爭奪的「符號資本」及其內部權力等級的劃分，而這種風氣恰恰是有悖於啟蒙與批判精神的。

本期的內容豐富多樣。從李金銓對90年代大陸傳媒改革、傳媒市場的興起和論述話題的深入細緻的分析評論，以及馮建三梳理台灣傳媒改革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大陸與台灣的傳媒改革都受到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壓力；朱雲漢與石之瑜都是從台灣學界經驗出發，檢討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如何超越西方理論範式的主導、確立本土化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曹聰分析了中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和科研體制的弊端；張翠容則揭示著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作品及其精神內涵，以上多篇文章都發人深思。本期同期刊出兩篇長書評，因為葛兆光與強世功兩篇文章無論是論題的重要性，還是論述的細緻清晰，都值得及時向讀者推薦。

最後，特別令我們高興的是，本期幾乎近半文章是出自十分年輕的作者之手，這表明《二十一世紀》在創刊12年之際，已經獲得新一代學者的認同與支持。我們期待中文學界更多的學術新人以本刊為交流園地。